

邓小平文献读书报告

元培学院 黄道吉 1600017857

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值；政治上国内的动荡刚刚平息，苏东阵营解体和共产党的倒台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改革开放被拿到台面上被从左到右的各类人物检验。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邓小平同志重新论述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方法，为中国改革的事业指出了明路。因为推荐的邓小平两篇文本在内核上的相似性，这篇读书报告会以南方讲话为中心，提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它的关系，以及南方讲话的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的传承。

两个讲话的文本内容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剥离掉时代因素，南方讲话的精神是在邓小平更早时期的讲话中就蕴含着的。《解放思想》的讲话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经济疲惫人心涣散，这和南方讲话出现的国内国际环境类似。在《解放思想》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阐述过以实际为中心的观点，并且要抛弃本本主义，大胆解放思想的做法，这些方面在南方讲话中阐述的更加通俗化（可能因为两次发言场合不同）。两篇讲话中都可以看到邓小平对经济发展的急切需求，而不陷入当时党内外的论战：无论是论定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是否正确，还是改革开放是否是资本主义。由于篇幅限制，下文将集中分析南方讲话的背景和内容，并试图从中提取出与时代无关的内核。

南方讲话是在党内外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看法出现纷争的情况下出现的。1989年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其中判断经济过热，政府急于求成，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没有“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在这个判断的指引下，1990年前后的工作集中在降低发展速度收紧经济政策上。这种趋势社会中产生了是否回归公有制疑虑，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仍处于外国制裁的情况之下。在1990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遣词中透露稳定超过改革的倾向¹，而当时的整顿手法也仍然是行政命令和指令计划为主的。更甚者有人提出应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些苗头邓小平是并不完全认同的，在早些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

¹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搞完全的计划经济…会把经济搞得很死…但是…搞单纯的市场经济…不符合国情”，“体改战线也出了几个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阴谋家”

翻一番。”

这种论断的纷争可以从当时报刊的评论员文章中看到端倪。1991 年《解放日报》刊登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中直称 1991 年为“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后续的两篇文章也传达了邓小平新年时视察上海的讲话精神，为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基调。但随后遭到一些报刊的批判，指责这些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1991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也批判这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到在当时这两种思想路线的冲突已经到了很明显的程度，同时党内不同声音的此起彼伏也给当时地方干部队伍产生了不小的困惑，对未来的施政措施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党内思想混乱，急需统一思想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很及时也很有效的，正如《解放思想》在彼时的作用。

南方讲话首先破除了当时国内的一大问题：改革开放是不是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回应是从实际效果出发的，他将视角移向改革开放的对政府、社会、个人的实际效果来看的。对政府来说，经济特区内的企业公有制仍然是主体，政府可以从外商的部分收到直接的税收和其他的间接好处，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地区社会生产力大大提升，特区发展日新月异，对个人来讲，工人也从外资企业中获取了工资和必须的技术管理经验。从实际效果来看，改革开放恰恰不是让资本主义有机可乘，而是利用资本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对于市场和计划的争议，邓小平也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这两种方式作为经济手段是平等的，也并不是和某种主义绑定的。中国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排斥某种资本主义的手段，中国有开放的态度也有试错的成本，而最重要的是敢于尝试所有手段，从实践中检验真理而不是被“理论家、政治家”的大帽子吓到。

邓小平敢于尝试所有手段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有底气的，这种底气源自于他对中国体制的观察和自信。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近年来的政策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这种拥护是历经政治动荡和经济兴衰也十分坚强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保障，改革开放的副产品：犯罪活动和丑恶现象能够被快速的消灭，新一代的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接班人保持着领导队伍的活力。而最根本的，中国共产党依据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道理，它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政权再到改革开放，这些经验必然也能够继续正确指导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

而在具体政策导向上，邓小平也为当时的当政者提出了良方，他用人民的视角考察政府政策的利弊。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施政的坚定支持者，任何政策的提出和实行都需要以人民为主体，需要考虑到人民的反应。这一方面要求政府的政策要长期稳定，并且要让人民感觉到长期稳定，长期且明显的思想路线论战对人心的稳定没有益处，也不能够团结一切力量投入到改革开放事业中去。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和各级官员在施政时要深入实践，“人民，是看实践”。在领导队伍中，要引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有成果的人才；施政时要破除形式主义，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实事当中去；要破除思想上的负担，因地制宜的尽快发展经济，“闯”出一条发展的道路。

以南方讲话为原点，此前此后的历史事件都证明着这种精神的实用性。向前回溯，我们可以看到它和《解放思想》讲话的前后呼应。实事求是作为两个讲话共同的关键词贯穿两个文本，事实上这种精神也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南方讲话这个时间点前的经济成就正是《解放思想》讲话的成果，也暗示着南方讲话的成功。南方讲话发布后的事实也正验证这邓小平讲话中判断的正确性。在思想上，下半年的十四大会议上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被写入党章，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重新统一了当时一度混乱矛盾的党内外思想。而在经济生活上，南方讲话之后的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增幅。对国外来讲，南方讲话也消除了时人对中国领导人改革态度的怀疑。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和南方讲话是分不开的。

南方讲话的影响力并不止步于彼时，剥离时代的因素，它的精神在今天也同样是实用的。在 21 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我们如何在多变的时代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在多变的时代建设共产党，这个问题是历久弥新的，而南方讲话恰恰是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邓小平的答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创新中开拓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并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固定的、寄生在“本本”上的主义，而是来源于、扎根在、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主义，这意味着它在形式上可能是会流变的，在不同时代给出不同解答的主义，面对文革后的中国，它可能给出《解放思想》一文中的解答，而在九十年代初，它就化身为南方讲话。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可能，尤其是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更应该深入十三亿群众参与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去。

南方讲话在新时代的今天仍然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性。习近平在 12 年就任总书记后第一个行程就是前往广东，并在行程中多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其间习近平本人轻

装出阵，多次和一般市民士兵深入交谈，并向邓小平的塑像敬献花篮。2018 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习近平再次调研广东，并在会议上指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明显的点出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迭代递进的阶段，它时时刻刻都面对着更新的更困难的问题，也要求执政党不断达到更高的目标。在这里“改革开放”不单单指一个政策，而同样指代一个几代领导核心确立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中国面对的问题一定都是《解放思想》讲话、南方讲话时期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是邓小平本人难以想象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历史，相反它基于实践扎根群众的本质反而使它在不同时代被赋予有时代特征的意义，在不同时代都可以作为指导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依据。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南方讲话的思想已经被新一代领导集体传承下来，被赋予了新时代的内容。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状态下，改革开放也面对着许多来自党内外的杂音，这和南方讲话前的中国形式有相似的地方，这要求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只有牢牢把握实践南方讲话的精神，才能够使得共产党保持是一个贴近群众的、为了群众的政党，才能让十三亿人民的生活水准有持续的提高，才能保障执政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不同时期的讲话，都拥有着相同的内核，其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是在多个历史时期都被证明有价值的。尤其是南方讲话这个过去了近三十年的文本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再次研读的价值，相反，讲话内核蕴含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适用并且应当被重视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对南方讲话的重视也验证着它历久弥新的内核：从实践中检验真理、从实践中造福人民、从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